

国际共运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关于斯大林问题

第三辑

(教学用书·内部参考)

杭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一年四月

关于斯大林问题

第三辑

(教学用书·内部参考)

说 明

本书仅供内部研究时参考之用，因此所印文章都按原文刊载，不作删节；篇目基本上按发表时间次序编排。

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文章中的观点和提法却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加以对待和评定。希读者注意。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一、回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波里斯·苏瓦林同布朗科·拉齐奇的一次谈话

.....毓 才译 (1)

二、斯大林传略 (六、七、八)

.....亚历山大洛夫 (21)

三、斯大林评传 (第八、九、十章)

.....托洛茨基 (51)

回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波里斯·苏瓦林同布朗科·拉齐奇的一次谈话——

毓才 译

【波里斯·苏瓦林于1895年生在基辅的一个手工工人的家中，一岁时随父母去法国定居，并加入法国国籍。苏瓦林青年时代即为法国社会党员，1919年担任“拥护第三国际委员会”的三名书记之一，1920年12月在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上提出动议。主张加入共产国际，从而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起，苏瓦林担任法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因从事托派活动，于1924年被开除出党。苏瓦林离莫斯科后，长期在法国、美国居住。

这一份谈话材料全文译自法国《快报》1979年12月15日——21日。拉齐奇系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

布朗科·拉齐奇：您同列宁第一次接触是在什么时候？

波里斯·苏瓦林：是在1916年。我那时二十一岁，在《巴黎人民报》任记者，这是一份带和平主义倾向的周刊。列宁那时四十七岁，在苏黎世过流亡者的生活。托洛茨

基刚被法国驱逐出境。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在瑞士的朋友们》。我在文章里为托洛茨基辩护，因为我觉得列宁对他的批评过火了。列宁在《致苏瓦林的公开信》中对我作了答复，坚持他的指责。因此，列宁和我在没有见面以前，我们就打过笔战了。

——您于1916年会见了托洛茨基，那是在巴黎第十区格朗日—奥—贝尔街的五金联合会会址，当时具有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社会党人正在那里开会。您对当时的托洛茨基还留下什么印象吗？

——他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讲话时嗓门很大。我记得，他同一位带和平主义倾向的社会党议员比埃尔·比利松在会上争了起来。托洛茨基想知道，布利松是否准备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所做的那样，在议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布利松藉口“这要取决于前线的形势”，避免作出明确的回答。假如德国人重新向巴黎推进，他不能指责法国为保卫国家所作的努力。托洛茨基大发雷霆，他站了起来，象个检察官那样用手指着布利松，大声说：“啊，要搞战略社会主义，这可新鲜！”这句话的意思是：科学社会主义全给忘光了。

——您于1921年6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才再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就在同一个场合，您第一次同列宁见面。

——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在场的还有共产国际的主席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第二号人物尼古拉·布哈林和领导了1919年苏维埃匈牙利的贝拉·库恩。法国方面，同我在一起的有法共负责国际联络的书记洛里欧，他是

早在1916年就已经拥护列宁的第一个法国社会党人。

会谈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大厦举行。列宁突然地向我们提了个问题：“你们将在什么时候在法国举行革命？”在年岁和职务方面都高过我的洛里欧一下完全给惊住了。他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于是按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答复说：“在法国，革命形势还不成熟。法国属于战胜国阵营，而革命只是在战败国阵营中发生。此外，原来的士兵已不再想打仗了，特别是打内战……”

六个月后，在1921年12月，还是当着我的面，列宁在会见另一位法国代表时，又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再次问了法国党准备何时进行革命的问题。这位法国代表名叫艾米尔·贝斯台尔，是位冶金工人，圣德尼区标准的无产者，法共的中央候补委员。问题显然使他感到不快。但他只是在会见后才把他的情绪表现出来，他说：“法国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这我那能知道？”

据我了解，列宁从此再也不向法国人提这个问题了。

——1921年至1924年，您在莫斯科，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您的生活如何呀？

——1921年6月，内战结束了。新经济政策代替了战时共产主义。许多店铺开了门，商品也从隐藏的地方神奇地冒了出来。人们向我们宣布，契卡已被取消。我们这些法国人，我们不能预料新的政治警察——格别乌——并不比原来的好……

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两幢大楼中度过的：著名的专门接待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卢克斯（ ）旅馆和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共产国际所在地。两座大楼之间的距离，走路不到一刻

钟，但有一辆面包车来回接送。我们在卢克斯旅馆的底层占有一个饭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习气还不太浓。我可以在自己房间工作，不必每天去共产国际所在地办公。

——列宁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出席共产国际的主席团会议，您怎么同他保持联系的呢？

——我手下有三位秘书，其中一位名叫印娜·阿尔曼德。她是印涅萨·阿尔曼德的女儿。而印涅萨直到1920年去世始终是列宁的女友。列宁待印娜犹如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因而不少人以为印娜真是列宁的女儿。我可不这样想。由于印娜住在列宁家里，我通过她很容易就可以同列宁取得联系，即使并非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同样如此。有一天，列宁让印娜带给我他用法文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康斯坦丁诺·拉查理的。列宁要我对他的法文作修改，我把这件事做得过于认真了。第二天，印娜对我说，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我的修改后放声大笑，说：“这可把我的文章改的一点不剩了！”

——您在莫斯科同反对派有过接触吗？

——有，刚到就有。首先是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列宁和托洛茨基批判“工人反对派”的文章，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它们曾在巴黎发表过。但我不了解反对派的材料。我的朋友比埃尔·巴斯卡尔给我搞到了“工人反对派”的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没有能够公开发表，但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散发过。我当时用俄文说话还有困难。幸好，反对派的两位主要发言人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法文说得很好，这就方便多了。我同他们保持了直接的和友好的联系。

——您对共产党外的反对派有所了解吗？

——我一到莫斯科，就去参观了关押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布提尔基监狱。这在共产国际是件空前的事。我受到了两种敌对的反应。一方面，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研究我的问题；另一方面，贝拉·库恩向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直接控告我，并说：“应该把他留在监狱里”。列宁回答说，我的位置不应该在监狱，而应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我在主席团里将能向党的领袖们学得经验。他甚至说：“跟我们一起，他会学的……”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歌德所说的“学徒时期”。就我而言，这段时期不到三年。1924年，我再次当了反对派，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不同政见者。

——您同居民的最初接触是在什么时候？

——在1921年。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主席团委员，我从早到晚都被工作压得直不起腰来。直到1922年，我才去基辅地区访问了我母亲的老家。家里人看到我坐着公家的汽车，在苏维埃官员的陪同下到达时，他们显得很有顾虑。大家说的话不痛不痒，我立即懂得他们为什么感到拘束。

——您什么时候认识斯大林的？

——1923年的夏天。好几位高级领导人在高加索的一个温泉疗养所基斯洛伏特斯克度假。布哈林邀请我住在他的别墅里，季诺维也夫以及未来的红军元帅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和最著名的女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是我们的邻居。托洛茨基住得略为远一点。他照例不上别人那里串门，自己在一边呆着，因此，后来他的敌人说他高傲，别人很容

易就相信。斯大林住在名叫爱森都基的另一个温泉疗养所。他一个人在那里，没有家属也没有同事和他在一起。显然，他感到无聊。他不时来这里拜访我们。我至今记得，他是坐了一辆供他使用的铁路巡道车来的。

——有保镖吗？

——没有。

——列宁周围的这四位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1923年夏天，列宁已第三次卧病不起。因此，他不管事了。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同我一起度假的这四位领导人手里：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我们断断续续地议论政治，但我们也骑马远行。我没有注意到有不和的迹象。

——斯大林给您什么印象？

——此人的文化修养不如其他三人高。我觉得他为人狡诈、不择手段、随时可能采取极端的方法。斯大林的一个本能反应当时使我感到震惊。格鲁吉亚的一些领导人来向我们汇报他们共和国的局势。他们谈到了格鲁吉亚的一些反对俄罗斯和反对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在山里组成的武装团体，以及这些团体的“土匪行径”。他们说：“要消灭这些团体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居民同他们互相串通。”那时，斯大林独自出来插话说：“不能枪毙一些人吗？”他一边说这些话，一边还做出用机枪扫射的姿势。

——美化斯大林的传记家和绘画家掩盖了斯大林左臂比右臂短的残疾。这一残疾明显吗？

——不太明显。不过，我觉察到斯大林往往以这种或那

种方式藏起他的左臂。例如，他有时摆出拿破仑的姿势来。

——你们在高加索的假期是太平无事地过去了，后来情况就变了？

是的。我们于8月底或9月初回到莫斯科，目标很明确：立即准备德国的革命。决定需要分两步作出，首先由俄国党的政治局，然后由共产国际主席团。

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利参与第一个机构的事，但布哈林把会议经过都告诉了我。政治局要对某个问题作出决定，开始总要把有关的人召来介绍问题的有关情况。为了对德国问题作出决定，就从柏林把德共的两位主要领袖亨利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召来。据他们的介绍，德国已经具备了革命形势。俄国党的政治局因此主张采取革命行动。

但是，在外表一致的后面，政治局内出现了一道裂痕。布兰德勒在他那篇鼓吹革命的发言中，要求苏俄以多种形式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其中包括派遣俄国革命的一位公认的领袖去就地领导一切。至于具体派谁的问题。布兰德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托洛茨基。刹那间，季诺维也夫被惊呆了。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而推举的人选却不是他！气氛一下子变得极其紧张。斯大林机灵地插进来说：“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地位太重要，不宜让他们去德国冒风险；他们对我们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我建议派卡尔·拉狄克同志和格奥尔基·皮达可夫去。”这两位领导人果然就去了德国。

——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德国革命开会的经过如何？

——主席团会议紧接着俄国党政治局的讨论后举行。当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确切的

建议时，我知道他们带来的是俄国党政治局在昨天作出的决定。

俄国党的政治局每星期四开会，会议往往开到深夜。而主席团的会议则是每星期五举行。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星期六季诺维也夫要乘沙皇的火车包厢回彼得格勒去；这个包厢，我曾多次同他一起使用过。主席团只是对政治局的决定表示认可。可是，我们这次会议有个特点：我们主席团成员共有十来个人，再加上德国党和俄国党的代表，然而，我们惊讶地看到党的总书记斯大林和政治警察的首脑捷尔任斯基也走进了会议室。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当然，他们不是共产国际任何高级机构的成员。他们出席会议象征地意味着，不仅共产国际，而且俄国的党和警察机构，全都站在德国共产党人的一边。

——您在什么时候知道了俄国党最高层的冲突？是在列宁逝世前几个月吗？

——在作出关于德国革命的决定以后，各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德国人回到了德国，莫斯科方面也有不少人潜入德国，至于我，则回到巴黎去。根据我们的计划，法共应该阻止彭加勒政府可能对进行中的德国革命搞武装干涉！我负责去贯彻这项指示。在莫斯科到巴黎的路上，我经过了柏林。我在柏林见到了拉狄克。他告诉了我俄国党政治局内存在的分歧。他说的有一句话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在政治局里是六对一（托洛茨基），希望这种状况能保持平衡”。拉狄克的这句话证实了托洛茨基在精神上对其他人具有的压倒优势。但拉狄克也表示希望争执不要演变成彻底的决裂。

——德国革命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就于1923年10

月21日、22日和23日失败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俄国派出的使者和德国党的领袖（他们那时已分成了三派），还有我，我们大家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但是，现在的政治气氛恶化了。德国革命的失败为算总帐提供了机会。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策划反对托洛茨基的阴谋，指责他长期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予以反击，重新提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1月的失败主义立场。季诺维也夫把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本来处境已十分困难的德国党两位领袖身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指责别人。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内部，开始了一场互相攻讦的混战。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了。您正在里昂参加法共的党代表大会。您当即停止了会议，以宣布这一消息。托洛茨基曾怀疑斯大林给列宁打了毒药针，以加快列宁的死亡，您今天对这一怀疑有什么看法？

——这一怀疑可能是有根据的，不过必须补充说，如果斯大林这样做了，那也无非是服从了列宁的愿望。因为，我可以作证，1923年列宁最后一次发病时，我在共产国际主席团遇见布哈林。他刚在哥尔克村见到了列宁。我们自然就向他探问列宁的病情。布哈林禁不住流了眼泪：“伊里奇要求早日结束他的生命。伊里奇反复地说：让我死吧！让我死吧！”布哈林当时的表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十三年后，斯大林居然在莫斯科诉讼案中，指责布哈林想杀害列宁！

——托洛茨基在日常生活中怎样？

——他对物质利益，对舒适，特别对奢华，一点不感兴

趣。确实，他占有了沙皇那辆车身与众不同的汽车，用于检阅部队。托洛茨基过多地考虑，甚至念念不忘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对日常琐事是不关心的。

他待人冷淡，没有很多私人朋友。他的私人朋友简直屈指可数！阿道夫·越飞、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法共党员中，最接近托洛茨基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尔。但即使这些亲近的朋友，他们同托洛茨基也并不“结伙成帮”。他的忠实朋友越飞于1927年11月自杀前向他写的告别信中，称他为“您”。此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越飞的信送到巴黎后，是我把信从俄文译成法文的。

由于托洛茨基于1917年6月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加上他待人冷淡，当老一代列宁分子听人说托洛茨基与众不同时他们很容易相信。在高尔基写的那本颂扬列宁的小册子里，提出了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两个对立的评价。我以为列宁确实作过这样的评价——不过是在不同时候做的——因为第一个评价是肯定的，后一个评价是否定的。在第一个评价里，列宁赞扬托洛茨基是一位难得的领袖：“象他这样能干的人，你能给我再找一个来！”但在后一个评价里，列宁说：“托洛茨基是跟我们在一起，但他不是我们的人，他身上有一点坏毛病，有点拉萨尔习气”。

——列宁呢，他在日常生活中怎样？

——他几乎任何人都不接待。只有两三个人例外，其中之一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也是对列宁使用昵称的唯一的布尔什维克。对列宁使用昵称的另一位社会党人是他青年时代的伙伴，早年革命活动时期的同志

尤利·马尔托夫，正如列宁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一样，马尔托夫成了孟什维克的领袖。你们可以注意到，即使在给他的女友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里，列宁也用“您”的称呼，只有两、三封信例外。

——托洛茨基的工作情况呢？

——他很有条理，很有自信心。十分遗憾，我把他的一次演说的提纲给弄丢了：那上面写得整整齐齐，着重号用红蓝颜色标出，引言放在突出的地位，论据按一定的次序排列。他下的命令，同列宁下的命令一样，是有力的，他记下的决定，人们很少发现在表述上有不连贯的地方。

托洛茨基的缺点方面：由于他经常对积极分子和对群众讲演，他同一个人或同三、四个人讲话时，也习惯于用在红场上发表演说的口气。1922年末，我领了一个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代表团到他那里去，代表团里有加斯东·蒙穆索，他后来在斯大林时代当过法共政治局委员和法国总工会书记。在1922年，蒙穆索和他的朋友们还不是党员，也不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在接见他们前，曾读过他们的一篇声明。他就当着他们的面对声明逐条予以驳斥。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那篇夸大其词的演说：“我宁可把手割断，也决不在这个文件上签字”，这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为震动。他们赶紧表示要作自我批评。

——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妻子们呢？

——她们都是革命前的老战士，不能让她们去烧饭做菜。她们继续参加工作，但政治地位不高。列宁的夫人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搞教育……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所说的清理图书馆的事。托洛茨基夫人或加米涅夫夫人——我记

不清到底哪一个了，因为加米涅夫娶了托洛茨基的妹妹为妻——在博物馆工作。斯大林的夫人娜捷施达·阿利路也娃是列宁的一个秘书。不过，中央委员会没有妇女。你们还记得列宁有一句名言：“每个厨娘都应该学会管理国家。”我们为了开玩笑，把这句话改成：“中央委员会里有几个厨娘？回答是：一个也没有”。

——1924年夏，您才29岁，就因为支持托洛茨基而被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开除出去。为什么他当时不为您辩护？

——我是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一个名叫《关于苏瓦林事件》的决议，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不能为我辩护，因为他应该遵循他的党的路线。既然他的党领头反对我，他就只能反对我。

——后来，你们的关系变坏了吗？

——没有，一点也不。我经常到托洛茨基的办公地点革命军事委员会去。他交托我一项使命，这是和当时莫斯科已经存在的监视气氛相适应的。根据“三驾马车”的命令，德共的两位领袖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被清洗后扣押在莫斯科，不能同托洛茨基有直接的联系。我就成了这对分不开的“伙伴”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络员。

我最后一次同托洛茨基交谈是1925年1月，就在莫斯科他的办公室里。我即将离开苏联。我们预料到俄国未来的阴暗前景，特别是托洛茨基本人的阴暗前景。那时候，他没头没脑地说了句简短的话：“他们会杀我的。”托洛茨基的这句话只比事实提前了十五年。

——在列宁逝世后的两年时间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

已经大权在握。共产国际和法共对他的印象如何？

——他在共产国际和法共都还不出名。关于共产国际，他于1924年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参加了波兰委员会的讨论。第二年，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讲了话。他两次发言都用的是俄文。他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中唯一不懂外文的人，这就自动地使他参加不了共产国际的讨论。

——在法共党内，除了您以外，还有谁认识他？

——没有了。下面举两个雄辩的例子。1923年末，俄国党在克里姆林宫圣安德烈大厅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次来莫斯科的法共中委阿梅代·杜诺瓦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过程中，他突然问我：“听说有个叫斯大林的，你在会场里能指给我看吗？”我回答他说：“你看见那个留小胡子的吗？就是他。”另一个例子：1925年10月31日，老布尔什维克、国防人民委员米哈伊尔·伏龙芝在莫斯科逝世。第二天，《人道报》以头版位置发表了悼念文章，附的却是斯大林的照片！因为在《人道报》报社，谁都不认识这位自称是列宁的主要助手的脸孔！

——您回巴黎后，继续同莫斯科的反对派保持了联系；第二年，即1926年，您得到了一份叫作《列宁遗嘱》的历史文件。您怎么搞到手的？

——列宁曾口授了两份机密文件：第一份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份是1923年1月4日。他在第二份文件中说：“……我建议同志们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把斯大林同志调离他的总书记职位。”在1924年1月24日列宁逝世后爆发的争论中，经常有关于这份遗嘱的影射，但在莫斯科，只有很少的人知道遗嘱的确切内容。至于西